

CHANTAL MOUFFE原著

張榮哲譯

葛蘭西的霸權和 意識形態論

長久以來，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式社會分析中，最常忽略的領域之一。但這是一個關鍵性領域，它涉及了一些重量級課題，這些課題不僅是理論性的，也同時是政治性的。但由於若干障礙，導致一種能適當解釋意識形態之角色、意涵的理論付之闕如，所以，嘗試著去了解這些障礙的本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不論就政治運動或理論來看，這些障礙都阻撓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我這樣說絕不是故作危言聳聽。

乍看之下答案似乎相當單純，效果上，各種障礙似乎都來自當代文獻所稱的**經濟主義**（economicism）這個現象。但是，這個字眼的過份化約，使得我們一旦想對它的範圍與特性作比較嚴格的界定時，一連串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雖然，很清楚地：經濟主義的各種形式都暗含了某種對政治與意識形態之自主性的錯誤認知，但是這種概括性的定義是不夠的——它可能造成兩種混淆：首先，從事實上來說，「經濟」這個概念就混淆不清，本身極難能自明（好比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相對重要性如何？）；第二，由於總是訴諸「從屬」、「化約」、「反映」等引喻，使得意識形態、政治到底是怎樣從屬於經濟，其機制混淆不清。這一來，經濟主義就可能有種種複雜的形式存在，而它們並不如乍看之下那樣容易辨別。

經濟主義與意識形態

我們可以在此釐出，關於意識形態理論，經濟主義所產生的問題之所以如此錯綜複雜的原由：這是由於經濟主義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而其中一些更是鮮能辨明。經濟主義對意識形態所持的問題架構，有兩個密切、但又截然有別的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視上層結構完全

為經濟基礎的機械反映，認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間有因果關聯。這導致把上層結構當做在歷史過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的**表象**（epiphenomena）。第二個面向關切的是上層結構的實際性質，而非其角色，在這裏，上層結構的性質被理解為可由各主體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所決定。第二面向不能等同於第一面向，因為前者可能賦予意識形態上層結構不同的「時序」（differential time sequences），甚至是某種「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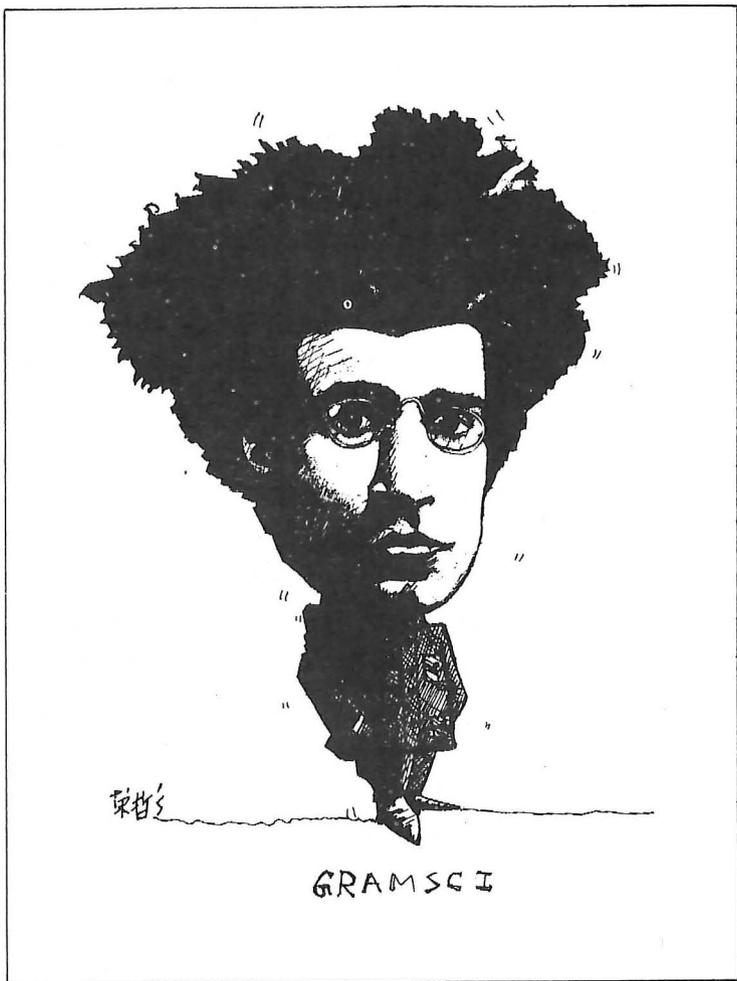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這兩者被組合到不同的形式裏，設法去了解這些形式顯然頗為重要。大致上可以把它們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兩者合一，是經濟主義的簡單、古典形式；第二階段，兩者開始分裂，脫離了古典看法，第三階段，與經濟主義的兩個面向絕裂，而以**基進地**（radically）反經濟主義觀，建立重新思考歷史唯物論所需的理論基礎。

有諸多原由可資說明，為什麼要想正確地理解經濟主義，就一定要對這三個時期加以區分。首先，雖然第二與第三國際均是經濟主義者的這個看法得到普遍的認同；但是，他們所涉及的種種經濟主義特定形式，並沒有充份地被釐清，其結果，使得「化約論」與「表象論」兩者有相互等同的傾向，至少被說成具有某種糾纏不清的關係。而看看那些所謂「上層結構」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看法吧（盧卡奇（Lukacs）、柯西（Korsch），等等）！他們對於意識形態這個概念，雖然拒絕了「表象論」的看法，卻仍然呈現出「階級化約論」，所以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他們也只是片面地與經濟主義絕裂。最後，我們必須了解第三階段才剛開始，對經濟主義兩個面向的更替，仍為大部份有待完成的理論工作。

徹底而基進地批判經濟主義，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可以說是第一人，這正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本文的目的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葛蘭西的貢獻。認知到這種研讀會遭遇什麼困難是極要緊的。其中一些困難是嘗試任何「徵候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時一定會碰上的，另一些則來自葛蘭西作品的特異性與片斷不全。而一個絕對要避開的陷阱，就是對葛蘭西進行工具式解讀（instrumental reading）——即利用其作品的缺乏系統性作出任意曲解，來支持一種假說，而這種假說和葛蘭西的並無多少關聯。如果說「徵候閱讀」必然涉及**操作一組問題架構**（problematic），那麼，將後者闡明，以避免把作為分析依據的概念系統之矛盾，轉嫁到所欲分析的文本中，就相當重要。另外，我們不應該忽略一個事實：隱藏在文本分析之下的「問題架構」乃是「外於」（external）文本的，而文本一致性的建立通常也未必與「問題架構」

我不抽煙，我25歲，我不認識葛蘭西。





葛蘭西

本身有多少關聯。這樣來讀葛蘭西，是用非化約論式的問題架構當基礎，我將從界定這個問題架構的一些基本原則開始，以避免任何混淆。我在此想提出的假設是：葛蘭西已經替這個反化約式的意識形態概念奠定了基礎。而只有在上述基本原則下，才可能判斷我的假設能否被接受。

非化約論對於意識形態概念所持的原則

非化約論的意識形態概念，構成了對葛蘭西進行「徵候閱讀」的基礎，其基本原則如下：

1. 具體物是由矛盾的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 所構成。黑格爾式的概念，把每一個「歷史際會」 (conjuncture) ，都化約為某單一矛盾的自我開展過程，其結果是，把「現前」 (present) 化約為一線性、既定發展中，一個抽象且必備的階段／要素（

moment)。面對這樣的說法，我會接受阿圖塞的觀點，在分析現象時，賦予「歷史際會」第一優先的地位，並視每一個際會為矛盾的多元決定，而這些矛盾，在**概念上** (abstractly) 都是相互獨立的。這種說法，構成了關於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非化約論式概念的基礎，而這樣的概念已經告訴我們，化約論事實上就是源自於馬克思主義採納了黑格爾式的歷史主義模式。在這種模式的引導下，一切矛盾都被視為一組單一矛盾，即，階級矛盾自我開展下的一個階段／元素；其結果是使我們將所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元素，都冠上了階級的色彩。鍛鍊一種非化約論式的，關於政治、意識形態的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首要課題，而這種理論，它將會說明為何經濟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

2. 在意識形態理論的具體個案中，那個同時是馬克思主義式的，又同時是非化約論式的概念，對於它的需求到底怎樣？依循阿圖塞的看法，我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生產主體的實踐 (a practice producing subjects)。主體不是意識／自覺 (consciousness) 創發的泉源，也不是某種主觀準則介入客觀歷史過程的外顯物；主體是某種特定實踐的**產物**，而這種實踐要透過召喚機制 (mechanism of interpellation) 來運作。根據阿圖塞的觀點，如果社會作用者 (social agents) 不是自身行動的基本法則，而僅僅是結構的承載者 (supports)，那麼，作為特定歷史時空下特定實踐的產物，社會主體們所認同 (identify) 的那些主觀原則，也不過是一些補缺用的結構元素而已。在這個案例裏，「多元決定」和「最終為經濟所決定」，這兩個原則是怎樣被串在一起的呢？首先來談談多元決定。

每一個社會作用者會擁有許多裁定意識形態的準則，絕不只一條而已：他或被召喚 (hailed, interpellated) 為性別、家庭、階級、國家、種族、或是美術欣賞者的一員，他活出 (live) 這些不同的主觀性 (subjectivities)，而他就是以一種交互糾纏的關係，被建構在這些主觀性上。而問題就在於要去決定這些主觀守則或意識形態元素間的那種客觀的關係。在化約論者眼中，所有的原則、要素都有其必然的階級屬性。但是，相反地，如果我們接受了多元決定的原則，我們必然會論斷，在這些原則、要素之間不能存有任何必然的關係，因此，也就不可能將它們附上某個必然的階級屬性。無論如何，正是在此時此地，「最終為經濟所決定」這第二個原則介入作用。只要階級仍被界定為最優勢生產關係中相互敵對的兩造，那麼，強調最終為經濟所決定也等於是強調最終為社會階級所決定。這致使我們有了下列主張：如果，被涉及到的意識形態諸元素真的沒有展現 (express)

社會階級，但是，如果雖然如此，階級最終又果真決定意識形態，那麼，我們必須斷言：這種決定（determination），只能是關於意識形態諸元素的接合原則（articulating principles）建構下的結果，一個導源於賦予（confer）意識形態諸元素以階級性的結果。無論如何，這個領域留下了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問題，同時，這裏也是對於非化約論式的意識形態理論的營造仍有待努力之處。一個意識形態的階級色彩是被其接合原則所賦予的，這個說法已經提供了發現答案的場域，不過它尚未對這個問題本身，提供任何理論上的答案。



我六十九歲，我也不抽煙

對於意識形態的非化約論式概念，上述兩點已經處理了關於它們的理論基礎，而且，我們已經指明了有這樣一塊場域，這塊場域仍舊將持續地被涉獵，目的是對意識形態的反化約論式概念做更嚴謹的型塑。本文的核心所在，正是要說明葛蘭西是怎樣認知這些問題，並且提出了怎樣的解決方案。我將會試著說明，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是怎樣在實踐狀態中（in the practical state），涉入一種關於意識形態的反化約論式問題架構的運作。我該更進一步地強調：這一整套關於意識形態的反化約論式概念，正是葛蘭西式霸權的實際領會條件（the actual condition of intelligibility），而且，我也該強調：在解析這樣的霸權概念時所遭遇的困難，全來自一個事實，即，全都肇因於截至目前為止，這個反化約論式的問題架構尚未被好好強調過這樣一個事實。

在深入分析葛蘭西的概念之前，我們有必要繞道第二國際迂迴前進。效果上，對葛蘭西來說，經濟主義並非什麼理論派或學院派的問題，正好相反，因為，經濟主義深植於第二國際的政治實踐當中，並且是一次大戰後十年間，德國與意大利的勞動階級運動遭遇重大挫敗的根本原因。葛蘭西的思想就是在這個脈絡下被理解，並取得其重要性。

第二國際與經濟主義

關於資本主義「大崩潰」的理論，是第二國際的主張，這種理論立基於某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在這裏，無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經濟矛盾發展下無可避免的結果。意識形態不帶有任何自主性，因為，在經濟矛盾加劇、做為一個階級的普羅大眾數量大增下，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是自然的結果。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意識被等同於社會作用者們的意識，而且，社會作用者的那些認同原則（principles of identify），會在自身所屬的那個階級中被發現。就這樣，經濟主義的兩種形式被攪在一塊了：也就是說，關於意識形態角色的表象論，和關於它的性質的化約論兩者被二合為一了。這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它的認識論基礎是一種科學上的實證主義概念，而這

種概念，是以當時物理學界流行的一種科學方法模式，來看待歷史唯物論。他們有了這樣的假設：「資本趨於集中」、「過度生產」及「無產階級化」，這三大規律被認為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分析基礎，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有憑有據，就完全要看這三大規律有沒有實踐經驗上的證明。這三大規律將被訂定，它們將自動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對這二者的深信不疑，導至大崩潰理論的捍衛者斷言社會主義的必將到來。誠如考茨基批判愛爾弗特綱領 (Erfurt programme) 時所言：

我們相信現存社會的崩解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自然而且必定地產生矛盾，迫使被剝削者起而抵抗私有制。我們知道，剝削者在數量上增加，在力量上增強了；他們的利益就在於維持既存的秩序上，而且我們也知道，這終將引爆人民大眾所無法忍受的矛盾；人民已經一無所有，被迫在暴行、愚鈍，或者是全面推翻私有制之間作一選擇。

就意識形態而言，第二國際是極端的化約論者。而且，因為認為意識形態諸元素都有其必然的階級歸屬，它由此論斷，資產階級論述中的所有元素都必須徹底地被勞動階級排除在外，勞動階級應致力於培育純無產者的價值觀，並防止一切外來的污染。這也就是「民主」怎樣會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了。

爲了要了解這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是怎樣存活，回溯那個年代的歷史氣候就顯得相當重要。一方面，這裏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已經成功地擴展它對全社會的控制，並成功地將有關民主的要求，接合 (articulate) 到它的階級論述當中。另一方面，勞動階級被組成強大的工會與群眾黨 (mass party)，使它在經濟要求上的鬥爭有成功的可行性。這種局勢在社會主義思潮中引發一股雙重的張力：a) 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之間，有建立這兩者間之徹底絕裂的必要，這種徹底絕裂，是在資產階級仍保有相當誘惑力的年代，社會主義運動能確保自身自立自主的唯一出路；b) 對於工人運動的革命目標，與在資本主義系統下進行改革所獲日多的勝利，有建立這兩者間之連繫的必要。考茨基的經濟主義充份回應了這兩項需求。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成功地將關於人民及民主的意識形態消化到它的論述之中，考茨基主義斷言，民主必然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這樣，民主不再像在青年馬克思那裏，被視為一個由資產階級發端，卻由無產階級總結的不斷革命的場域；轉而替之的是，它成了某個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階級性的判準開始成爲所有 (社會) 層面的基本判準，這說明了階級化約論這個經濟主義的特徵之一是怎樣發端的。另一方面，如果勞動階級不參與對其它社會力的領導，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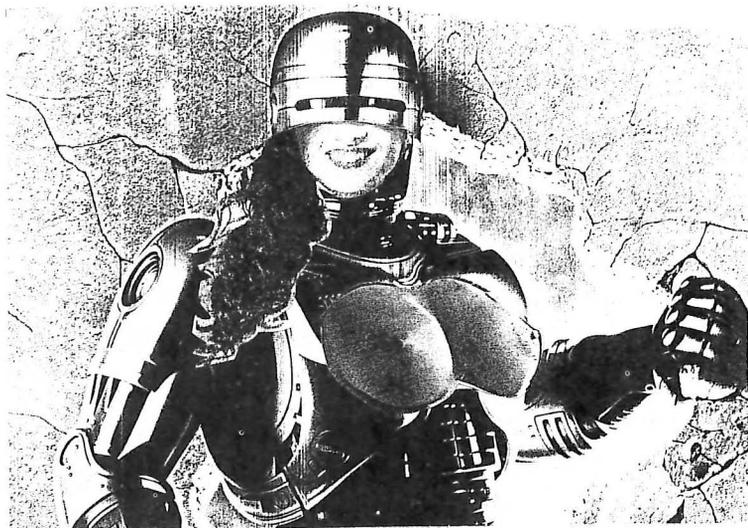
局限於保衛自我的私利，那麼，革命，不再是無產階級將自己呈顯為所有被剝削者的另一種政治選擇，而有意介入的結果；革命，將只是代言了既有經濟矛盾內，那些可行性的開展。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理論。無論如何，因為這種崩潰只單純地被視為純經濟力運作的結果，經濟力因此被認為涵括了一切解釋歷史進程的必備元素。其結果，政治與意識形態變成了單純的表象，這是考茨基經濟主義的第二個特徵。

在二十世紀初期，這種機械論遭受多方責難。不過，對於考茨基教條的批判，它們的發展自有其特色：就算是在那些與之乖離、甚或敵對的格式中，這些批判雖然指出了考茨基主義內的相互矛盾與前後不一，但並沒有拋棄它的若干假設。更甚者，這些批判否定了作為一個理論體系的考茨基主義，卻又同時發展了它意識形態假說下種種不同的潛能。這種傾向在伯恩斯坦和有關修正主義的辯論中特別顯著。由於資本主義大崩潰的理論預設並未實現，並且，因為關於勞動階級會自覺社會主義意識（如英國勞動階級）的這種理論中，有若干顯見的矛盾，伯恩斯坦被迫拒絕了那個他聲稱無法解釋具體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他以「道德標的」（ethical ideal）式的社會主義觀替代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也就是說，以「道德標的」做為一種社會形態，而認為人們應該自願地借助若干道德律驅策自己前往。

伯恩斯坦明白：從資本主義最新的發展局勢看來，大崩潰理論再也說不通了；此外，在資本先進國家，上層結構正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這就是為什麼不同於考茨基，他會看出正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中擴散之勞動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了。因此，也就是認識到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意識形態問題，使得伯恩斯坦向經濟主義版的馬克思主義宣戰。無論如何，因為他確信馬克思主義就是大崩潰理論，他對經濟主義的批判於是引導他完全將馬克思主義排除在外。效果上，伯恩斯坦認為，賦予意識形態任何積極主動的角色必然與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理論相衝突。因此，伯恩斯坦與馬克思主義的絕裂，只是局限在某個理論框框內，這個框框由第二國際關於意識形態的假說所建構，而這框架從沒有被嚴厲的質疑過。如果，在某方面他將馬克思主義等同於大崩潰理論，另一方面，他則將民主等同於資產階級議會民主。這就是為什麼，**做為特定客觀層面的政治、意識形態**，關於它們的自主性的理論，絕不能用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來當做它們的基礎。對他來說，客觀性（objectivity）就意謂著決定。其結果，雖然他直覺到階級化約論與經濟決定論無能理解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特殊問題，他在智識上的唯一替代卻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一段飛離客觀性的航途，主觀性——「道德標的」的全面介入歷史。這使得他求助於康

其中之一就是視革命為意識與意志（will）介入歷史的結果，用以反對歷史宿命論與經濟決定論的說法。這代表了戰前自發——主觀論（voluntarism—subjectism）的延續。青年葛蘭西視布爾什維克勝利為一場對抗《資本論》的革命；索雷爾則視之為關於意志與解放力（liberating volance）方法的勝利。在混沌的戰后世界，各種反現狀（anti—statusquo）的意識形態蓬勃滋長，對許多社會陣線而言，布爾什維克主義變成了一種elan（革命熱情）的象徵，拒斥所有的拘禁與客觀限制。

另一個可行性是試圖建立起意識的首要地位，並建立關於政治這



ROBO 葉：活學活用葛蘭西的霸權觀念，才可以打敗男性沙文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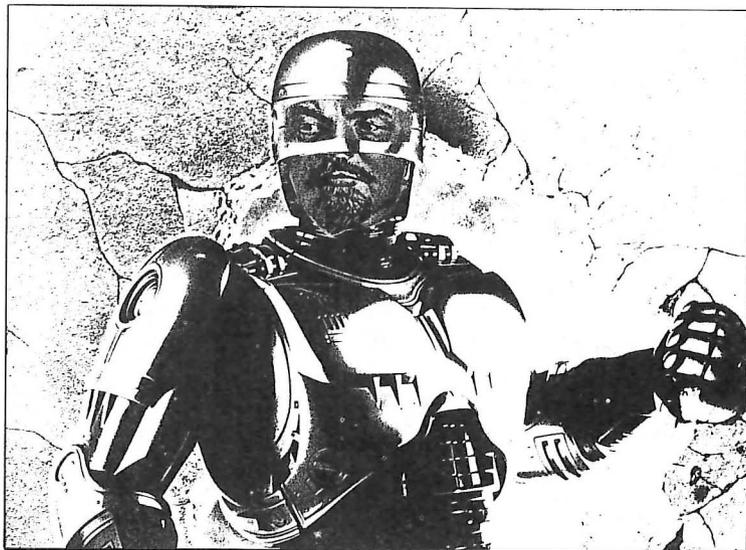
個元素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要能與客觀的階級邏輯相容。這是有可能的，只要我們以生產過程中的位置定義階級的同時，同時認為在階級自我發展的最高階段會製造出階級意識。這種見解正是盧卡奇在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立論的基礎，而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驅除經濟主義的過程中，只成功了一半。效果上，由他堅稱意識形態具有某些確切的功能這點觀之，盧卡奇是一名反經濟主義者，因為，他賦予意識形態以某些效能（efficacy），但是，在意識形態的本質這一點上，他還是無法擺脫化約論的陰影。對他而言，意識形態即階級意識，因此，他將它界定為，由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所決定的，某個社會階級之「被賦予的意識」（imputed consciousness）。這表示盧卡奇已經和第二國際的表象論絕裂，但尚未與階級化約論劃清界線。他片面地繼承了列寧主義的遺產，只延續了列寧主義所開創的兩條路線之一。

第三個可行性是試圖從列寧的政治實踐中，粹取出它所有的理論

德的道德律。從索雷爾 (Sorel) 到克羅齊 (Croce)，這些在本世紀初試圖反抗實證主流的諸大哲，高舉著自發主義 (voluntarism)、主觀主義、甚至是非理性主義 (irrationalism) 的名號與之進行鬥爭。在機械論變成客觀性之同義代名詞的當時，知識界並無其它出路可尋。

列寧主義及其後續

如果說，在第二國際的思潮中，化約論與表象論是以糾纏不清作為總結，那麼，俄國革命的經驗則提供了打碎這個纏結的基礎。一方面，革命在全歐洲最不可能發生地方爆發了——這明顯地和某理論相



ROBO 列寧：我之所以自願成爲機器戰警，是爲了替馬克思主義尋找新出路。

矛盾，這種理論認爲革命只是經濟力機械式開展的結果。很顯然，這次革命事實上乃肇因於政治介入歷史際會的結果，而傳統馬派卻認爲這個際會目前不可能生出社會主義的果實。因此，將歷史變遷歸結爲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關係的變動，關於這樣的政治性推演，就會受到質疑，也就會質疑起表象論的假設。另一方面，列寧對混成發展的分析，以及俄國革命期間，將民主口號化爲社會主義版本的作法，都替青年馬克思關於民主與階級之辨證的分析，帶來新的威望，並將蘇聯革命直接連結上因1848年失敗而中斷的，不斷革命的環結。就這樣，化約論的假設同樣被嚴苛地質疑。但是，在這個主題上，列寧的分析在某些方面相當簡明有力，而某些則失之混淆，因爲，在不同的方向上，它們仍受制於老朽的問題架構。事實上，是列寧的政治實踐，而非其思想，被證實具有足夠的轉化力，能粉碎這個世紀初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狹隘的經濟主義小框框。

這裏有三個可行性能夠更進一步發展列寧主義所展現的新開端。

潛能，這將會徹底、基進地質疑經濟主義式問題架構的所有面向。很不幸的，尾隨1920年代理論研議之蓬勃發展而來的，是史達林主義時期的死寂一週，這種死寂，有效地凍結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展達十年之久。但是，也就是在這期間，有人在第三導向上作出獨一的貢獻。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中，在他對於勞動階級運動上的挫敗，以及法西斯主義致勝的反思中，在孤獨的囚室內，安東尼奧·葛蘭西來到了一切錯誤的源頭：一種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角色與本質在認識上的匱乏。在他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以下簡稱《札記》））裏，這導至他以基進地反經濟主義論的角度，重新思索馬克思主義中所含的中心課題，並因而發揮了列寧主義所呈現的所有潛能。

葛蘭西與霸權

現在，在極大要地描述過葛蘭西思想發展所屏障的馬克思主義式問題架構後，我們必須回到本文的核心，那就是，葛蘭西對於馬派意識形態理論的貢獻。讓我們再一次重申我們的論點：這種論點在於顯示，這樣一種關於意識形態的基進反經濟主義式問題架構，必須在葛蘭西式霸權概念的**實踐狀態中**運作；並且，它也建構了關於它自身能被實際領會的條件。因此，我將從分析葛蘭西那些關於霸權的文本開始，目的是要給它下定義，並研究其發展。然後我將探討它對於馬派的意識形態理論造成了那些影響。在葛蘭西的著作中，霸權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26年的〈論南方問題〉（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以下稱〈南方〉）。它是這樣子被介紹的：

都靈的共產主義者正具體地提出「無產階級的霸權」這個問題，即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及工人國家（State）的社會基礎的問題。無產者能成為這樣一個領導（dirigente）及支配的階級，以至於能成功地創造一種結盟系統，這種系統使得它能動員大多數無產的人民，對抗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國家。在意大利，以這裏實際的階級關係來說，也就表示它成功地贏取了農民大眾的「統一」（consent）。

這標示出葛蘭西思想上一大步。他自然是在1926年之前就已經知道結盟農民的重要性，因為，在1919年一篇名為〈工人與農人〉的文章中，他即堅持農民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所必須扮演的角色。無論如何，在〈南方〉中，他是第一次以霸權這個概念來討論結盟的問題，並且強調這種結盟所必備的政治、道德、及智識條件。例如，他堅持勞動階級必須完全擺脫組合主義（corporatism），以便贏取南方知識份子的支持，因為，正是透過這些知識分子，勞動階級才能影響農民大眾。霸權的問題下存有智識與道德面向，已經在此成了某種葛蘭西的註冊商標，並將在稍後取得其重要性。雖然如此，我們對霸權的理

解卻仍舊停留在列寧主義的階段，也就是，霸權仍舊被視為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那也就是說，有鑑於霸權仍然以階級結盟這樣的字眼被思索的事實看來，政治領導權才是它的實質內容。然而，就是在時序上僅僅稍後的《獄中札記》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典型的葛蘭西式霸權概念，在這裏，霸權成了政治、智識、道德這三種領導權所形成的不可割離的統合（union），這顯然是超越了階級結盟這種單純的想法。

霸權的問題架構在《札記》的第一冊中就可以發現，但後來又有了一項重要的創新：葛蘭西不再單說它是無產階級的**策略**，也用它來思考一般統治階級的實踐活動：

下述歷史、政治判準，我們在做研究時必定要以之為基準：一個階級以兩種方式宰制：即，宰制（dominating）並且統馭（ruling）

。它統馭結盟階級，並且牽制敵對階級。

毫無疑問地，當葛蘭西談到統馭結盟階級時，他所指的就是霸權。而貫穿《札記》，有無數的片段指稱這種效能。例如，同在《札記》1的前沒幾頁，當他檢視雅各賓（Jacobin）黨在法國大革命中的角色時，他說：

不僅是組成了資產階級政府，使資產階級變成了宰制階級——他們做的還要更多。他們創造了資產階級**國家**（State），使資產階級成爲這個國度的統馭、霸權階級；換言之，他們給了這個新國家一個永恆的基礎，並創造了堅實的現代法蘭西國體。

他指出，正是藉由強迫資產階級克服組合員（corporate）的性質，雅各賓黨造就資產階級成爲雄據霸權地位的階級。雅各賓黨實際上是迫使資產階級去拓展它的階級利益，並發掘與其它人民部門（popular sectors）的共通利益，同時，也就是在此基礎上，他們才能置自身於司令之位，領導這些陣線進行這場鬥爭。

再一次地，我們又發現，在〈南方〉那裏遭遇過的，組合主義者與霸權階級間的對峙，不過，這次是用在那些資產階級身上。事實上，葛蘭西已經開始明白，資產階級同樣必須確保自身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他也明白，政治鬥爭要遠比那些化約論者所想過的要來的複雜多了，因爲，它不單是兩個敵對階級間的對抗，而總是要涉及各勢力間的複雜關係。

在《札記》47的一個基本章節中，葛蘭西分析了所有社會中各勢力間的關係，並研究從組合員到霸權階段的轉換過程。他一開始就從區分這些力量關係所在的三個主要層面著手：

1. 社會力關係，與下層結構有關，並視關於生產的物質力之發展而定。

2. 政治力關係，這是說，不同社會團體內部，團體的自我意識與組織化的程度。
3. 軍事力關係，葛蘭西說，這總是一股決定性的力量。

對於政治意識之不同階段的分析中，他又細分出三個等級：

- a. **原始經濟階段**，在這個階段裏，做為同一個團體，關於它職業上利益的意識被表達出來，不過，有關做為同一個階級之利害關係的意識，則尚未展現。
- b. **政治經濟階段**，就在這裏，關於階級利益的意識被表達出來，不過只限於經濟層次。
- c. **霸權階段**，在這階段裏，人們自覺到，在現在或未來的發展中，自己做為一個組合員的利益，必須超越純經濟階級帶著組合性質的局限，並能夠且必須，也成為其它附庸團體的利益。對葛蘭西來說，這裏就是放置特殊地政治性元素的所在，並為意識形態鬥爭所標幟著，這樣的鬥爭，試圖鍛造一個經濟、政治、智識目標的統合，「置所有鬥爭的主題於『全盤的』，而非組合員的層次，因而造就一個主要 (fundamental) 團體對其附庸團體的霸權。」

我相信，這段文字（兩年後的《札記》13之中葛蘭西又把它再製為更確定的形式。）是了解葛蘭西式霸權的關鍵性文字之一，而令人驚訝的是，竟然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事實上，葛蘭西在這裏提出了一個與〈南方〉中完全不同的霸權概念，因為，在這裏，它不再是簡單的政治結盟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政治、智識與道德目標的全面統合；這個統合，經由意識形態的中介，會由一個主要團體與其加盟

1917年騷亂的杜林



者一起完成，而這個意識形態會頂力「散佈在全社會，不只決定業已統合的經濟、政治目標，也決定著智識與道德的統合」。從《札記》4之後，這種列寧主義式的霸權概念是加倍地豐富了：首先是進一步用它來說明資產階級的霸權，然後是增加了一個新的、主要的面向，即智識與道德的面向（因為只有借助這個實踐，政治層次上的統合才能實現）。就在稍後，葛蘭西會進一步全面發展這塊地方的豐沃潛力，但是在《札記》4中，霸權已經確立了它特殊的葛蘭西面向。也就是在上述基礎上，我們才可能提出一暫時性之**霸權階級**的初步定義：一個已經能夠藉由意識形態鬥爭，接合自身與其它社會團體利益的階級。葛蘭西認為，這種霸權階級，只有當這個階級放棄緊禁的組合員念頭時，才可能型塑成功；因為，為了實施領導，霸權階級必須誠摯地關切那些它欲施于霸權的社會團體的利益——顯然，霸權的主張預先設定了我們要將霸權施予對象的利益、傾向列入考量，而且，霸權也假設了某種程度的均衡，這也就表示，霸權團體將犧牲某些作為組合員的天性。這樣的霸權概念，當它接連上葛蘭西如何思索國家（state）的角色、性質時，會產生重大的結果。

將國家視為某個團體的機關是正確的，國家註定要為某個集團的最大擴張創造有利的條件。不過，這個特定團體的擴張、發展卻被構思、並表現為，社會全體擴張的發動機，或是被表現為一項集全國之精力的發展。換句話說，支配團體被具體地等同於其附庸者的普遍利益；而且，國家的一生，會被理解為一連串均衡（就司法上來說）的型塑、替代過程，這均衡是指主要與其附庸團體的利益之間，持續進行的非恒定式均衡而言——在宰制團體多佔的那個部份進行均衡，但止於某個程度，即，僅止於放棄狹小的組合式經濟利益。

這種霸權的問題架構正是「國家擴大化」（enlarging of the state）的根基，布姬·葛呂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已經強調過它的重要性了。這將允許葛蘭西與經濟主義式的國家概念絕裂，即，不再單視國家為支配階級手中的高壓統治機器，並且型塑了「專政＋霸權」的「**整合國家**」（integral State）概念。在這裏，我不分析葛蘭西對馬派國家理論的貢獻（雖然它很重要），我將限於指出「國家擴大化」著力的兩個層次：其一，它涉及國家的社會基礎之擴大，並涉及國家、霸權階級與其大眾基礎三者間的複雜關係；其二，它涉及國家功能的擴大，因為，所謂的「全國家」即暗含了將霸權機器、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整編到國家裏面去。

至於一個階級如何變成據於霸權地位，葛蘭西提供了兩個途徑：第一種是「轉換法」；第二種是「擴大霸權法」。讓我們先來看看轉

換法。這是溫和派 (Moderate) 在意大利民族復興時期 (Risorgimento)，在各勢力交戰尋求一統的狀況下，確保自身霸權的方法。這方法是在於「借助效力各異的種種辦法，逐漸而持續地，吸收加盟團體所釋出的那些活性 (active) 元素——甚至是那些來自敵對團體的活性元素……」。這自然是一種較差的霸權形式，而且，經由這樣得到的共識，也只是「被動的共識」。事實上，葛蘭西稱這種權力取得的方式為「消極革命」 (passive revolution)，因為，借助某個吸納系統，並將大眾的利益中性化 (neutralization)，民衆不斷地以這種手法被整編起來，目的是阻止它們妨礙霸權階級的利益。葛蘭西把這種經由吸納而得來的霸權與所謂成功型的霸權，即，**擴大型霸權**相對照。這種形態的霸權端賴於締造一種主動而直接的共識，而這種共識，則是來自於霸權階級坦誠地採納其它人民階級的利益，而這種採納，會創發一種真正的「全國人民的意願」 (the national popular will)。不像被動革命將大多數人民階級排除在霸權系統門外，在擴大型霸權中，全社會都必須參與。對於這兩種霸權的區分，使得我們有可能更進一步地細緻化業已提出的關於霸權的試驗性定義。事實上，如果霸權被定義為，一個階級接合其它社會團體利益到自身利益上的能力，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有兩方法來完成它：這些團體的利益可以被接合以便中性化它們，進而防止它們發展個別的要求；或者，他們也可以做另一種接合以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而最終解決那些它們所呈現的矛盾。

這些文本觸發了更進一步的觀察。首先是，只有主要階級 (fundamental class) 能成為霸權階級 (主要階級是指佔據決定性生產模式中，生產關係兩極的階級)，葛蘭西就斬釘截鐵地說：雖然霸權是倫理／政治的，它也必須是經濟的，必須根植於經濟活動的決定性核心中，統馭團體所操演的決定性功能。這個條件不僅局限了霸權階級的可行量，也顯示了任何霸權形式可能的底線。事實上，如果說雄心勃勃的統馭階級，它的霸權運作涉及經濟上的、做為組合員時所享有的利益上的犧牲，那麼，統馭階級再怎樣也不至於去危及自身的基本利益。因此，做為一個剝削者，或早或晚，資產階級總有一天必須起而面對自身霸權的極限；因為，在某個水平以上，它的利益必然要與其它人民階級的利益相衝突。而這種現象，根據葛蘭西的說法，就是它功能消耗殆盡的信號，從那時起，這個意識形態集團 (the ideological block) 就傾向於毀滅，就這樣，「強迫」取代了「自發」，以甚至更少的偽裝，更非委婉的方式，在直接的局部軍事行動，或者是**軍事政變** (coupsdetat) 中達到高潮。因此，只有勞動階級，其獲利的起點恰是所有剝削者所能容忍的極限，能夠成功地開創一個擴

大型霸權。

葛蘭西式霸權的最重要面向仍舊等著被研討。這個面向就是**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以及獲取它們的方式。事實上，上述有關霸權的總總，也只能將霸權說成是一種階級聯盟而已。但是，如果葛蘭西的霸權只是限於政治領導權，那他和列寧不同的，也只是葛蘭西不只視它為無產階級的策略，而認為它也適用於資產階級。現在，我們已經明白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要比列寧豐富多了，因為，它增加了一個新面向，這個面向夾纏地被接連上政治領導權，而這個面向就是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其結果是，建構霸權成爲一個遠超越單純的階級結盟的現象。事實上，對葛蘭西來說——而這也是他獨到之處——霸權是不會存於階級間單純地工具式（instrumental）結盟中，而透過這種結盟，加盟階級的階級索求（demand）被接合上主要階級的階級要求，而每個階級在這個聯盟中仍舊保有其個體性和個別的意識形態。根據葛蘭西，談到霸權就意味著要創造一種**優越綜合**（a higher synthesis），所以，所有的元素都會溶入「集體意願」（collective will）之中，而這個「集體意願」，它將會擔任霸權生命過程中，政治行動的新主角。意識形態型塑了這種集體意願，因為，集體意願的存活有賴於創造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統合做爲「接著劑」。這裏就是葛蘭西霸權的這兩個面向能牢固地統合在一起的關鍵，因為，「型塑集體意願」和「施行政治領導權」都端視智識與道德領導權能否確立。解釋這兩個面向及它們接合的方式，無疑地，是研究葛蘭西式霸權最困難的地方。更甚者，這也說明了爲什麼至今，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獻，但卻還是建構不出一個全盤性的霸權定義。事實上，大多數的解釋都只是片面地強調這個或那個面向，這樣做，通常會引發差異甚大，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解釋，這就完全要看它們是否特別偏重政治領導權或智識道德的領導權而定。而那些少數企圖同時說明這兩個面向的解釋，不是弄錯了這個或那個面向的概念，要不然就是弄錯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如果說我們決定性地想要建立一個葛蘭西式霸權的全面性定義，既要說明它的特色，又不能忽略它任何的潛力，那麼，我們就必須理論性地思索關於它的兩個成份之間的那種關係是什麼，也就是說，它們統合在一起的祕密是什麼，並且也要能看出，那些由此而出的特色是什麼。要這樣做，就必須回答下列的問題：各社會團體間真正的意識形態統合如果付之闕如的話，它們如何能被統合爲單一的政治主體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當然必須討論葛蘭西作品中，明示或暗示過的，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這樣，我們才會知道，爲何在經濟主義式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下，根本不可能具體理解葛蘭西式概念的特異性。

霸權和意識形態

要分析在葛蘭西式霸權問題架構下運作的意識形態概念，最佳的出發點就是研究他如何擬想新霸權型塑的過程。為什麼型塑集體意願必須通過道德與智識的改造呢？（這種改造是「現代君王論」的工作）；對於這個問題的註解，會是這主題的最大啓示。不過，我們首先必須討論葛蘭西少數幾段明白闡示意識形態的文字。

意識形態的問題架構

葛蘭西直接地表明，他完全不同於那些只視意識形態為錯誤意識，或那些視之為觀念系統的看法；同樣的，他也反叛了只將意識形態化約為沒有效能之單純表象的所有「表象論」形態：

這個主張，把自己弄的好像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原則一樣，聲稱每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波動都可以被理解、闡明為（下層）結構的直接展現。這種理論上的幼稚病必須被爭議，而且，它在實踐上必然遭受正牌馬克思主義的迎頭痛擊；馬克思：具體政治與歷史性論述的作者。

根據葛蘭西，所有關於意識形態的研究，它們的起點必定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上層結構的意識形態領域內，人們得到關於他們所從事之職業上的意識」。所以，後來他堅持意識形態必須被想成是「有效能的運作實體」，而且，馬克思如果有時會用幻象（illusion）這類的字眼來稱呼它，那也只是基於論戰上的考量，目的是為了清楚地標幟出它們的歷史性與無常性。葛蘭西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一個場域，「在那裏，人們活動，得到關於自身地位的意識、鬥爭」。他說，意識形態必須被視為一個戰場，一場持續的鬥爭。因為，人們將不會以個人的身份，透過意識形態去取得意識，而會是通過兩個霸權原則（hegemony principle）交戰的意識形態場域的中介，來取得這樣的意識。效果上，只有透過對意識形態的形構，才可能取得自我意識，而這種意識形態形構，不僅包含了論述元素，也包括了非論述元素，葛蘭西用含糊籠統的字眼「服膺」（conform），來指稱這種對於意識形態的形構。這種透過「服膺」來取得那些必備意識的方式，導至一個事實，即，「每個人都總是大衆人（mass-man）或集體人（collective-man）」；當葛蘭西指陳這種說法時，他的意圖就清晰可見了。事實上，我們在這裏有這樣一個概念，即，各個主體不是原初地給定的，而總是透過那個被社會性地決定的意識形態領域，由意識形態所生產出來的，所以，主體性總是社會性實踐的產物。這暗示，意識形態有一個物質性（實體性）的存在，絕不是精神意志的總合，而它總要在各種實踐中被具像化（被賦予實體）。葛蘭西將意識形

態等同於宗教（將它當做一種具有行動準則的克羅齊式世界觀）時，就像它強調意識形態組織行動一樣，它強化了意識形態做為實踐的本質。葛蘭西認為，在效果上，這種世界觀會在一切活動中彰顯，而且，這種世界觀會以極精巧的形式，和高抽象的姿態——以哲學為例——展現自己，或者說，它會以比較簡單的形式，好比說「常識」（common sense），表現出來，這種「常識」把自己弄得像是大街上某路人的自發哲學一樣，但它卻是高級哲學的大眾化型式。這些世界觀從來就不是個別孤立的事件，而是有關一個社會集因的共同生活的外顯，這也是為什麼葛蘭西要把它們稱為「有機意識形態」（有組織功能的意識形態）（organic Ideologies）的原因了。就是這些東西「組織了人類大眾」，並做為個人與集體行動的啓益性準則，因為，人們就是透過它們得到所有形式的意識。但是，如果人們果真是透過這些有機意識形態取得自身的意識，而且，如果這些有機意識形態，恰巧都是某確切團體的世界觀，那麼，這就表示所有的意識都必然是政治性的。這使得葛蘭西劃出了下列等式：哲學=意識形態=政治。這個等式已經被普遍地誤解，並且加重了對葛蘭西式歷史主義的誤會，這樣的誤會，將葛蘭西式的歷史主義呈現為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葛蘭西想做的，就是思考主體性的角色，但也因為這樣，而使他不至於將它呈現為個人意識對於歷史的介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斷言，意識不是原初地給定，而是個人被嵌入的那個意識形態系統的效果。因此，是意識形態造就了主體性並使之運作。

葛蘭西認為意識形態有操作性和主動性，意識形態即政治。意識形態是生產主體的實踐活動，這個想法的確暗含在他上述的看法中。然而，他並沒有必要的理論工具來充份地表達他的直覺，他只好滿足於將就著使用帶有強烈克羅齊歷史主義色彩的那些模稜兩可的公式。讓我們舉意識形態的定義為例：意識形態是一種對於這個世界的概念，它彰顯在藝術、法律、經濟活動，在一切個別與集體生活之上。意識形態又被葛蘭西認為是一種披有行動守則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是人類得到所有關於意識的形式的場域。如果我們將原先的定義放入後二項來檢證，一切都變的再明白不過了：這個關於意識形態的定義（它決不能被理解為，一個由意識形態擔綱演出的，黑格爾式的展現型總體性問題架構。），必須被理解成它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各種可行的主體類型都是由意識形態創造出來的。

關於葛蘭西式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另一個嶄新的面向就是，強調**意識形態實踐的物質性與建制性**。效果上，葛蘭西強調這種實踐擁有自己的作用者（agents），即，**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負責著墨與散佈有機意識形態的人，他們也是那些即將必須實現智識與道德改造

的人。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兩大類：與兩個主要階級之相連繫者（稱之為有機知識分子）；與過往生產模式中之階級相連繫者（稱之為傳統知識分子）。除了強調知識分子角色外，葛蘭西也堅持，對於意識形態的著墨與擴展來說，物質結構與制度結構有其重要性。這個物質性、制度性結構是由各種的**霸權機器**（hegemonic apparatus）組成的：學校、教堂、媒體、甚至是建築物、街道的名稱。這些霸權機器的總合，葛蘭西稱之為某牽制階級的**意識形態結構**（ideological structure），而生產及擴散這些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就被稱之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一個社會集團的政治與社會霸權就是透過這些「私有部門」（private bodies）的總合來運行的。

現在，很明顯地，我們已經遠離那些關於意識形態的經濟主義式問題架構，葛蘭西也被安置在與之相異的場域。葛蘭西的新穎處，就是他警覺到意識形態的物質性，以及它建構的一種銘刻於機器（apparatus）之上的實踐，而這種實踐在所有社會中都扮演不可或缺的實踐性——社會性角色。他直覺到這種實踐參與了主體的生產，不過他並沒有能夠著力於將之更理論化。除此之外，我們不應該忘記，葛蘭西在表達這些概念時，是用一種今日看來已過時的模稜兩可的語句。因為，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那時唯一堅持著墨於反經濟主義式問題的智識傳統，就是克羅齊的歷史主義。總的來說，葛蘭西並未開始著力經營一種關於意識形態的理論，而且，其想法的呈現方式又不是很有系統。但是，在說了上面拉拉雜雜的一堆話後，我們仍可斷言：葛蘭西在許多層面替阿圖塞預先做了鋪路的工作：意識形態的物質性；它做為所有社會形構的必要層面；它生產主體的功能，這些葛蘭西都暗示過，雖阿圖塞是以較嚴謹的方式將之理論化的第一人。

一個非化約論式的概念

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式意識形態理論的貢獻，並不僅止於展現出它們是客觀性、操作性的實體。它們如同經濟本身一樣實在。還有，它們在所有社會形構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無論如何，這樣的概念僅僅明確地取代了經濟主義中的第一個面向，而仍舊給不同形式的化約論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間。現在，葛蘭西不再滿足於著墨已多的表象論批判，他質疑起化約論者所說的，意識形態的單一功能就是給主體一個階級位置的這種說法。毫無疑問地，這是他最重要也最有原創性的貢獻。而不幸地，這也是他最不為人知的面向，它說穿了這地方所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式分析的潛力為什麼仍舊停留在未開發的狀態。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更困難的領域，因為，葛蘭西從未明示過這個反化約論式的問題架構，雖然它的確存在於其霸權的實踐狀態之中。因此，我們必須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架構，它是葛蘭西式霸權的

「實際領會要件」所在。無論如何，在我們進入那些可供參考的文本之前，有必要簡短地摘要一下化約論式意識形態問題架構的三原則，因為，這會使我們更容易看出葛蘭西和他們之間的差異何在。這三個原則就是：

- 1.所有的主體都是階級主體；
- 2.社會階級都有其典型的意識形態；
- 3.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其必然的階級屬性；

葛蘭西的見解顯然和這第一原則相衝突。依照他的看法，那些政治性行動的主體不能被等同於社會階級。如我們所知，根據這些政治主體是意識形態造就的霸權系統之政治展現來看，它們是會遵循特定法則的「集體意願」。因此，經濟層面的主體（社會階級），並不會在政治面複製；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各種內容迥異的「跨階級式」

(inter class) 主體。這造成了葛蘭西與化約論第一原則的絕裂，提供他必要的理論基礎，使之超越單純的階級聯盟，並視霸權為優越統合 (superior unity) 的創造，在那裏，霸權集團一切的參與元素都會相融其中。我們都知道意識形態會實現這種融合，但仍舊有些問題：如何融合？在什麼基礎上融合？效果上，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回答這個我們之前所型塑的問題的時候了：如何創造不同團體間真正的意識形態統合呢？方法有二。第一種只能在化約論式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中成形（如原則2、3所示例的）。這種方法在於，將意識形態統合視為，主要團體的意識形態強加在其加盟團體身上的產物。這引導我們一方面將霸權階級定義為：在自身的意識形態扮演支配者的基礎上，一個有能力與其它團體達成一致的意識形態的階級；另一方面，則引導我們將意識形態問題架構，化約為只是意識形態銘刻的現象。這是普蘭札 (Nicos Poulantzas) 看葛蘭西式霸權的方式。據他說，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指射了一種階級宰制的狀況，這種狀況涉及了某種領導的功能，借助這種領導，創造那些被宰制階級的主動共識，如果就此而言，這種說法就相當神似盧卡奇所說的那種階級意識——世界觀的國家（民族），因此也就神似黑格爾主義式的主體式問題架構。普蘭札聲言，如果這類的問題架構被帶進馬克思主義，就會跑出像「階級是歷史的主體，是一個社會型構的真正總原則」這一類的說法。就它決定宰制階級在一確切宰制系統內的附著力 (adhesion) 而言，意識形態、意識世界觀被視為歷史的主體，奠基了社會形構統合。

這種版本的葛蘭西，只有將霸權等同於據宰制地位的意識形態之強制權才可能會發生（以盧卡奇式的宰制階級的世界觀、意識來理解）。我想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成功地展現了這種說法完全是對葛蘭西的一種曲解。事實上，這的確阻礙了普蘭札去全盤掌握葛蘭西式的

霸權概念，而這也使得他在這樣的說法中發現了一些無法相容的元素，特別是這種版本的葛蘭西被沿用為無產階級的策略之時。普蘭札認為這種沿用無法接受，因為，「它暗示了一個階級強加自身的世界觀於社會形構上，並且暗示了，這個階級在爭得政權之前，就實際地爭得宰制性意識形態這塊地盤」。現在，葛蘭西不僅指出一個階級在其劫取權力之前，就變成霸權階級的可行性；他還堅稱這種作法的必要性。我們果真能說這個部份不甚搭調嗎？如果是，那麼依這概念的重要性來看，勢必嚴重地影響其全盤的想法。

換個角度來看，這不也正指出一條異於普蘭札版本的理解葛蘭西式霸權的方式嗎？也就是說，我們有了這樣一個概念，這概念是假設關於創造意識形態統合的問題，能夠在非化約論式的概念下被解決。事實上事情就是這樣，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這個葛蘭西思想的重要面向至今還沒有被注意過，因為，在位居宰制的馬派化約論中，它完全是不可想見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說一說可能型塑意識形態統合的第二個方法——葛蘭西的看法。當然，這種看法不會是某個團體對其它團體的意識形態強制權。葛蘭西設想經由智識與道德的改造能建立新霸權；對於他怎樣設想這個過程的方法的分析，將有助於理解這個課題。

如我們所說的那樣，智識、道德改造的重要性是基於一個事實，那就是，主要階級的霸權就在於一種「集體意願」的創造（在權充統合原則的普同世界觀這個基礎上），在那裏，這個階級與其加盟者交融為一個「集體人」。

從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推論出「文化面」的重要，甚至是在實踐性（集體性）行動之中。一件歷史性行動只能由「集體人」來擔綱演出，而這同時也預設了「文化社會」統合的完成；經由這個統合，零散的多頭意願，在平均、普同的世界觀這個基礎上，被整合為單一目標。

因此，新霸權的建立，暗含了要轉變過往的意識形態領域，並且暗含了要創造能權充新集體意願之統合原則的新世界觀。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過程，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智識與道德的改造」。現下最緊要的，是看看葛蘭西如何擬想這整個過程。在這個脈絡下，下面兩段文字就顯得十分重要：

最重要的是批判（criticism），新歷史的第一個徵候會將舊的意識形態叢結送入這種批判之中。這樣的批判，使得改變舊意識形態中諸元素之比重變得可行。從前是次級、從屬，甚至是可有可無的，現在都變成了首要的——變成新意識形態叢結的、新理論叢結的核心。舊的集體意願將被消解為相斥的單元，因為那些下層者已經

全面性地發展開來了。

易言之，這個以自發意識姿態出現的歷史意識，該如何被型塑呢？吾人如何選擇、組合於建構這個自發意識的元素呢？要不要排斥那些已被冠取（imposed）元素的優先性呢？是該如此，因為它們已被冠取過了，但不是排斥它本身，而是說必須給它一個新的形式以應新給定團體的特別效用。

在這裏，葛蘭西格外清楚地指出，智識與道德的改造並不是要掃蕩既有的世界觀，而代之以另一個完全嶄新、業已型塑完畢的世界觀。這改造是建構在轉換（目標是造一個新形式）與重新接合既有意識形態元素的過程之上。據他的說法，一個意識形態系統是建立在一種特殊對於元素的接合形式上，並經由這系統給不同元素不同的「相對比重」。意識形態鬥爭的目的不是排斥這個系統及其元素，而是要重新接合它，將它打散為其基本單元，然後在這裏面找找看，經過一番內容上的修正後，哪些能用來展現新的局面。一旦這樣，那些被選擇的元素就決定性地被再接合到另一個系統了。

從這個方向來看，很顯然道德與智識改造在化約論那裏是完全不可理喻的，在那裏，它預先為每個階級設定了典型的意識形態，並且，它也預先設定了每一個意識形態元素必然的階級屬性。如果，效果上我們果真接受了化約論的假說，那麼，道德與智識的改造，就只能是用某個階級意識形態取代另一個。因此，以勞動階級的霸權為例，勞動階級必須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洪流中解救出它所需的盟友，並將它們冠上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為此，它要迎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必須完全排除它的元素，因為這些元素無可救藥地沾滿了資產階級的惡臭，萬一它們其中之一在社會主義式的論述中出現，就會證明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已經被資產階級所污染；在這個事件中，意識形態鬥爭完全被化約為兩個封閉之既定系統的對抗。這當然不是葛蘭西的見解。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說他的意識形態概念不能夠是化約論式的，因為他所擬想的智識與道德改造在那裏是完完全全地不可理解。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葛蘭西式霸權理論下的意識形態概念呢？為了明瞭這點，首先有必要確定葛蘭西會給下列問題什麼樣的答案：

1. 意識形態系統的統合原則是什麼構成的？
2. 怎樣決定一個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元素的階級性呢？

由此，我們進入葛蘭西思想最未被開發的面向，而且，我們可能必須知足於一些不甚確切的指示，對於這些指示，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一次**徵候閱讀**。一開始，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個問題所有我們已經分析過的要素。我們知道，在葛蘭西那裏，霸權（只有主要階級才可能

有霸權)的建構,必須在霸權系統下經營政治、智識和道德的領導權,而且,這個系統需要靠一個普同世界觀(有機意識形態)來黏合。我們也知道,霸權階級之智識與道德領導權的建構,不是靠著將其意識形態強加於其加盟團體的身上。一次又一次地,葛蘭西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每個單一的霸權關係都必然是「教學式的」(pedagogic),而且,這個關係乃生之於它的各個相異組成力量之間。他也強調:在一個霸權系統內,領導團體與被領導者間必然存有民主。這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來說也是正確的。當然,它也暗示了那個統合霸權集團的普同世界觀事實上就是整個集團的有機展現(在此我們得諸有機意識形態的主要意涵)。這樣的世界觀因此包含了源頭各異的意識形態諸元素,不過促成它統合的卻是霸權階級所提供的接合原則。葛蘭西稱這種接合原則為**霸權原則**(a hegemonic principle),他沒有把它定義的很清楚,不過似乎是說,它涉及了一組價值系統,而這價值系統的實現,則端視主要階級在生產關係中所扮演的中堅角色而定。因此,在霸權系統中,主要階級的智識、道德領導,就在於提供普同世界觀一組接合原則,而來源各異的意識形態諸元素將被接合到這組價值系統下,以便於型塑統合的意識形態系統,也就是型塑一個有機意識形態。這將總會是一個複雜的總合體,它的內容永遠不能被預先設定,因為它必須端視整個關於歷史與國家/民族的元素序列而定,且同樣有賴於特定時空下,爭霸各勢力間的關係。因此,經由對霸權原則的接合,意識形態諸元素得到了那些不是與生俱來的階級性。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這些元素在接合其它霸權原則時,是可能「調轉槍口」的。意識形態鬥爭,事實上就是在兩個霸權原則佔取這些被給定元素的鬥爭中,對於這些元素的**解合——再接合**(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過程。它確實不是兩個業已完工的、封閉的世界觀之間的對抗。因此,任何特定時空下的意識形態統合都是不同霸權原則間較勁的結果。

現在有可能來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 1.意識形態系統的統合原則,是由霸權原則建構的,它接合了所有意識形態元素。它總是主要階級的展現物。
- 2.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元素的階級性,是來自這個做為接合核心的霸權原則。

但是,要解決所有問題還早的很。例如,這些沒有必然階級性的意識形態元素,它們的性質如何?它們展現了什麼並不清楚,葛蘭西也沒有給我們答案,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解決問題的蛛絲馬跡。在一段論及何為一個霸權原則戰勝另一個的決定性關鍵的文字中,葛蘭西以為,一個霸權原則不是以其內在邏輯來確保其優

勢，而是當它想辦法使自己變成「人民宗教」(popular religion)的時候。我們怎樣解析它呢？在別處，葛蘭西強調，一個階級想變成霸權階級時，就必須「使自己國家／民族化」(nationalize itself)，他更進一步地說：

關於霸權的道德／政治元素，展現在國家與祖國命脈中的，就是「愛國」(愛國主義)與「愛民族」(民族主義)，這是「人民宗教」，也就是說，它是實現領導與被領導之統合的環結。

爲了解葛蘭西在說什麼，有必要將他那些關於「國家／民族——人民的」(national-popular)的見解，全部攤在一起看。雖然這些概念沒有被全盤公式化，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它卻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對葛蘭西來說，每一件能展現「人民——國家／民族」(people-Nation)的事，都是屬於「國家／民族——人民的」。一個成功的霸權就是一個著力於創造「國家／民族——人民集體意願」(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的霸權，爲此，霸權階級的霸權原則，必須能夠接合所有「國家／民族——人民的」意識形態元素，只有這樣做它才能成爲全體利益的代言人。這就是爲什麼在殘酷的階級爭霸戰中，那些「國家／民族——人民的」意識形態元素總是會岌岌不保的緣故。在葛蘭西總視這些東西時，當應用於不同階級，接合上不同霸權原則時，他標示出像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等不同詞項所呈現的不同意義。他也強調，這些詞項會統合領導與被領導者，並做爲人民宗教的基礎。

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明白他在說些什麼了，他聲言，一個霸權原則一旦費心去成爲人民宗教時，就確保了他自身。他要說的就是，在階級爭霸戰中，最事關緊要的就是試著將所有「國家／民族——人民的」意識形態元素都接合上它的論述。這也是他如何能「使自己國家／民族化」的原因了。

葛蘭西式霸權所提示的，處於實踐狀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就是使意識形態諸元素接合不同的霸權原則，因而改變意識形態諸元素階級性的這一組實踐。這就斷言了這些元素自身不會表現出階級利益，而它們身上的階級利益，是它們接合的那個論述，以及由那裏生產出來的主體所賦與它們的。

霸權和陣地戰 (war of position)

現在，在葛蘭西所暗示的非化約論式意識形態問題架構被廓清後，我們才可能掌握其霸權的全盤意涵：一個階級是位居霸權的，當它已經開始會將社會形構中，意識形態諸元素的絕大多數接合到自己的論述中的時候，特別是那些使這個階級展現這國家／民族利益的那些國家／民族——人民要素。因此，一個階級的霸權，是遠比單純的政

治領導權來的更複雜的現象：效果上，後者只是另一個首要面向的結果。這是一個業已統合的意識形態論述的創造物，而這個論述，是某社會特定歷史際會下，意識形態元素對其價值系統接合的產物。所以，這無必然階級屬性的元素成了階級爭霸戰兩造的意識形態戰場。因此，一個階級如果是霸權的，那麼，它絕非如某些版本的葛蘭西所說的那樣，絕不是因為它成功於對社會強加自身的階級意識形態，或是成功於建構將自身合法化的機制，這種說法完全改變了葛蘭西思想的本質，因為，它把他對於意識形態的見解化約為「偽意識」這樣的傳統馬派概念，這必然導至只將霸權視為一種意識形態銘刻的現象。很清楚地，當葛蘭西宣稱「政治不是呆頭鵝們的市集（March'ede dupes）」時，他想反叛的就是這種化約論。對他來說，意識形態不是一個業已成型的階級勢力之它者能被神祕化的——能神祕化它者的（mystified—Mystifying）護辭，它是人們得到自身意識的場域，而且，霸權也不能被解釋成一個意識形態宰制的過程。

一旦我們理解了葛蘭西式霸權的真正意涵，所有那些看來相互矛盾的說辭都會從他的思想中消失。例如，為什麼葛蘭西能同時將這個概念應用為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實踐這樣的問題，就變得再清楚不過了。還有，他擬想的一個階級在奪得政權前就先成為霸權階級的可行性的原由，也同樣清楚多了。事實上，就是將霸權等同於意識形態宰制的這種想法，使得我們無法去掌握葛蘭西思想的內在一貫性，並使之淤塞矛盾。無論如何，一旦我們領會了在葛蘭西式霸權概念之實踐狀態下運作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其它的概念，很自然地會在建構完密的大架構下各適其位，其思想的根本意涵也就顯露在其首尾一致性當中。我只想舉個例子說明，不過這是極要緊的一個，因為，葛蘭西將用它來當做思索西方如何步入社會主義之策略的基礎：我所指的正是陣地戰。

葛蘭西關於勞動階級支持社會主義鬥爭的策略，是環繞著霸權的概念而組織起來的。這個想法是始於霸權現象的擴充，也就是說，葛蘭西認為它也可以適用於資產階級，因為，他認識到國家（state）的力道不止限於單一階級的能量，而且，資產階級正著力於確保自身擁有一個「歷史性基礎」——一個其霸權機器領導下的被結盟的團體。經由這個方式，它已經造就過了一個「集體人」，執行了自主性政治主體的功能。葛蘭西由此得到這樣的結論：政治鬥爭不只發生在兩個敵對的主要階級之間，因為，上述的那個政治主體不是社會階級而是集體意願，而這個集體意願是由一些社會團體環繞著一個主要階級融合而成的集合體。因此，如果說，在最終時刻敵對階級間的鬥爭構成了所有政治性鬥爭的決定性層面，那麼，在社會構內各團體間

其它的鬥爭，都必須被接合到它的身上。這些其它團體將會供給宰制階級以「歷史性基礎」，而階級爭霸戰也就是在這個領域內展開——主要階級即藉此試圖贏取其它社會團體。因此，革命的手段不能被局限成絕對的階級運動，並發展無涉於社會其它局部的純無產階級意識；通往霸權的路途一定要考量一種雙重的手段：做為一個自主團體的自我覺醒；同時要創造一種做為共識的基礎：

這些改造力量如何被發現，如何從下屬團體成為霸權宰制的團體，關於這樣的研究，必須找出、並且確以他們奪權的階段：i 從它們必須摧毀的敵人那裏所得來的自覺；ii 從主動或被動幫助他們的團體那裏所得的支援。在它們能以國家（State）的形式統合前，所有的這些手段都有歷史地必備性。就是借助著兩個判準，在不同階段中，這些改造力量所獲得的歷史、政治自覺才能被衡量——而不單是以它們與上一個宰制力量離異程度來裁判。

因此，不將自己隔離在無產階級潔癖的小圈圈內，對勞動階級來說，就成了性命攸關的一件事。反其道而行之，它必須試著變成「全國家／民族的階級」，代言多數社會團體的利益。要這樣做，就必須要拆解資產階級霸權的歷史基礎，要拆解它，就必須解合那個展現資產階級智識導向的意識形態集團。事實上，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勞動階級才能重新接合（再接合）出新的意識形態系統，而這個新系統，將做為勞動階級所領導的那個霸權集團的接合劑。這個解合——再接合的過程事實上就是著名的陣地戰，而對於那些因著市民社會發展，資產階級已經牢牢鞏固其霸權的國度而言，葛蘭西以為，陣地戰會是一個最佳的革命策略。除非吾人已經掌握葛蘭西霸權之真正意涵——即，一個主要階級將一個社會形構中之意識形態諸元素接合到它論述中的能耐——否則，我們不可能會明瞭陣地戰的本質。效果上，陣地戰就是意識形態鬥爭的過程，兩個主要階級試圖藉此佔奪那些非階級的意識形態元素，將之整合到以自身霸權原則為核心的那個意識形態系統當中。雖然這只是鬥爭中的一小步——霸權集團接合自身的一小步，但是它卻是決定性的一步，因為，葛蘭西說過：「在政治上，一旦我們已經贏了『陣地戰』，我們就已經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只要人民的力量集結到社會主義陣營，而資產階級發現自身已孤立無援，那麼，社會主義集團要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其結果是，遠不同於某些版本的葛蘭西所呈顯的改革主義風貌。陣地戰，它代言了朝向政治與意識形態之非化約論式概念這政治性的策略轉變。這裏強調了意識形態鬥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社會主義鬥爭所必須設想的「人民戰爭」形式：「在政治上的霸權概念就是陣地戰。」葛蘭西這段文字只能以反化約論式的意識形態問題架構來理解，而這個

問題架構已經被呈顯為其霸權概念的實際領會條件。只有真正掌握這個關鍵，我們才能瞥見它所觸及的政治性影響。社會主義革命不再被視為絕對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由勞動階級所領導的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轉換的複雜過程。上述的政治性影響都具體被呈現在這樣的概念當中。陣地戰，被理解為在所有反資本家的陣線內進行爭霸戰；它說明了葛蘭西為何會堅持這是一場「全國性」的鬥爭。

國際局勢必須以各國度的局面來考量。事實上，任何國家的內在關係都是原創的、（就某程度而言）獨一無二的化合產物。如果我們想支配、牽引它們的話，這些關係就必須以它們的原創性與獨特性來理解。當然，發展是朝著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走，但是出發點卻是一國的（national）——這也是我們啟航點。

結論

在這篇文章中，我曾力爭，在葛蘭西的思想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處於實踐中的基進反經濟主義式意識形態問題架構，我也同時強調，它是葛蘭西霸權概念的實際領會要件。無論如何，我不是宣稱馬克思主義中關於意識形態的問題都被葛蘭西解決了——甚至在實踐狀態中而言。無論如何，那些他被迫使用的概念工具已經被完全替代了，而且，歸功於諸如語言學與心理分析等學問的發展。現在我們有了更嚴謹的配備來處理關於意識形態的問題。無論如何，這裏有好幾個理由可以說明葛蘭西對於馬派的意識形態理論有決定性的貢獻：

1. 葛蘭西是強調意識形態物質性的第一人，它作為一切社會形構的必備面，它於實踐中的銘刻，在機器（制）中的被具體化。
2. 他基進地與偽意識這種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絕裂，這種概念是認為偽意識是對於現實的曲扭的再現，因為，它是被生產關係中的主體位置所決定；而且他預期了意識形態作為生產主體的實踐這種概念的出現。
3. 最後，他也質疑了化約論的大原則，即以爲一切意識形態要素都有一個必然的階級屬性的這套講法。

就前兩個論點來看，葛蘭西的想法完全由阿圖塞繼承，並進一步發展——雖然後者以殊異的方式達成同樣的觀點——而且，因為這樣，葛蘭西的觀點已經傳遍了整個阿圖塞學派。而至於他對化約論的批判，相當不幸地，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沒有被認識清楚，他在此領域內的理論潛力仍急待開發。這種開發看來特別要緊，因為，馬克思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理論仍未著力使自己完全地從化約論式的問題架構中解放出來，而仍舊被種種狹隘的經濟主義形式所陷構。

對於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葛蘭西的大

作所帶來的話題性與重要性，在於他替最嚴重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問題指出了一條可行的解決之道。這問題就在於，一方面要驅除經濟主義，又同時要堅守歷史唯物論的問題架構。事實上，意識形態被視為表象的這個初步階段被跨越後，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然必須面對下列困難：如何去顯示在意識形態實踐是真的具有某些自主性與效力的同時，而仍然堅守最終由經濟決定這個原則呢？阿圖塞本人還無法令人滿意地解決它。這也是為什麼最近他會被攻擊為一個經濟主義者的原因。無論如何，如果這些批判有提出一個有效解決經濟主義的作法，那麼這必定要以犧牲歷史唯物論做為代價。效果上，將最終由經濟所決定這說法等同於經濟主義，提倡意識形態實踐的全面自主性，用這些手法來作為一種解決的手段，他們就是質疑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內容。

在葛蘭西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另一種解決之道的略本，在我們決定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架構下，經濟主義的問題是否真的無法解決之前，它值得我們來分析一下。如這裏所見，這種霸權的問題架構包含了一種可行的接合，即，意識形態相對自主性與最終由經濟所決定，這兩個原則在實踐中可行接合的大略圖示。事實上，從葛蘭西式的霸權概念下引出的意識形態概念，讓意識形態有了真正的自主性。因為，意識形態實踐想轉換的那些意識形態元素並不具有必然的階級屬性，因此，不是做為經濟層次之利益的再現物。無論如何，在另一方面，這種自主性並不是不能和最終由經濟決定這原則相容。因為，接合這些要素的霸權原則總是由主要階級所提供，當然，我在這裏只是指出可能會發現答案的地方。如果工作仍朝著這個方向進行的話，

葛蘭西之妻(中)與二子





報導葛蘭西死訊的新聞

那麼，在我們可能找到解決方案之前，仍有大量的問題待解，雖然這麼說，這仍應該被證實是一塊富沃之地。

最後，我想指出葛蘭西式的霸權概念所開創的另一片富沃遠景，這可以在他關於政治的概念中發現。葛蘭西極注意這個概念。因為，他畢竟聲稱經濟主義應該被痛擊，不只是在關於史觀的理論上，同樣地——尤其特別地——是在政治實踐與理論上。他又說，在這個場域內的鬥爭能夠且必須借助發揮霸權概念來指導它。經濟主義顯露在政治場域的方式的有相當大的差異。從第二國際的「走著瞧」（wait-and-see）一直分佈到極左派的「死硬派」（purism），這是兩個在台面上對立的形式，但是它們也同樣都表現出對於政治實質與它在社會形構中，角色的認知不足。經濟主義的主要錯誤——對於上層建築的表象論和化約論——在這個領域中，以對於國家（state）和政治概念的**工具式**見解表達出來，將國家等同於鎮暴機器就是化約了政治場域，因為它和意識形態鬥爭的臍帶關係被切斷了，葛蘭西那種與霸權的角色關係密切的「擴大型」國家概念，回復了這個被遺忘的政治面向，而意識形態鬥爭成了政治鬥爭的基本層面。政治不再被視為特異的專家活動，它成了展現在所有人類活動中的一個面向，效果上，如果說個人除了參與成爲「大眾／人」（mass-man）外，無能成爲一個主體，那麼人類經驗的每一個層次都逃不開政治，政治擴散一如「常識」之所在。

這樣的政治概念使我們對**權力**（power）的研究能創發一個嶄新的方向，而這方面的研究，馬克思主義者通常都沒有能令人心悅誠服的處理好它。事實上，一旦有關政治的霸權面向被重新建立（這個面向在葛蘭西關於「整合國家」的註解中浮現），而且，一旦我們接受了一個階級的優勢不只是在於支配對手，而也要借助對加盟者的領導，那麼，權力絕不止限於鎮暴國家機器那回事，我們可以領悟「權力」會在社會各層次運作，權力也是一種策略——像傅柯（Foucault）說的那樣。這又是葛蘭西式非化約論霸權概念所開創的另一片研究領域，也是相當熱門的一個。

事實上，相當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一些特異的政治研究——傅柯或德希達（Derrida）所作的，這些研究替政治帶來了嶄新的意涵——與葛蘭西確有滙流處，而且，在認識過葛蘭西思想的非化約論特質後，我想，如果我預言葛蘭西作品的熱度與影響力在未來會日趨重要的話，這應該不是一件過於冒險的事。

■